

宋詩菁華

——宋詩分體選讀

張鳴 編著



宋詩菁華

——
宋詩分體選讀

張鳴
編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詩菁華：宋詩分體選讀 / 張鳴編著.——初版一刷.

——臺北市：三民，2016

面；公分.——(國學大叢書)

ISBN 978-957-14-6127-4 (平裝)

1. 宋詩 2. 詩評

820.9105

105002045

© 宋詩菁華
——宋詩分體選讀

編著者 張鳴
責任編輯 張加旺
美術設計 郭雅萍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6年2月

編號 S 83441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6127-4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看完書稿校樣，三民書局編輯先生叮囑要寫一篇序放在書前。關於宋詩的時代特色、歷史地位、發展演變以及本書選注體例等需要說明的內容，已經在前言中有所交代。這篇序就簡單說說自己讀宋詩的一些體會吧。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追隨先師趙齊平先生研讀宋詩時，宋詩還時常被作為反面教材，宋詩研究更是門庭冷落。那時，常有師友對我的選擇表示疑惑，因此，常要向他們解釋為什麼。當然，更多的時候，是要找出理由說服自己。說服自己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不過歸根到底，好的理由還在宋詩本身。那時，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註》是手頭常翻的書，但讀這部詩選的感受，卻有很多困惑。《宋詩選註》是名著，學術水平之高，有口皆碑。錢先生選詩，眼光如炬，書中所選的作品都很優秀，尤其注釋所體現的博學睿智更令人佩服，許多注文都以過人的學養和感悟揭示出所選詩歌的精彩，可是在全書的序言中，錢先生在總體上卻對宋詩多有微詞，似乎並不怎麼欣賞。這種反差頗讓人疑惑，雖然後來對個中原委有一點了解，但當初的這個困惑，卻成了促使我去認真翻閱宋人詩集的重要原因。那時《全宋詩》還沒有編纂，研讀宋詩只能依靠閱讀宋人別集和《宋詩鈔》。好在北大圖書館藏書豐富，尤其原屬於燕京大學圖書館古籍藏書中的宋人別集，不僅收藏全面、系統，版本豐富，而且書目卡片做得非常專業，學術信息一應俱全。當時一邊在趙齊平先生的指導下做《宋元文學史參考資料》的注釋，一邊根據燕大藏書目錄卡

片的指引，將宋代詩人的別集，按時代先後一家一家讀下去。開始時受學養限制，對宋詩的好處並無太多體會。後來讀得多了，慢慢發現，其實宋詩真的不像世人批評的那樣一無是處，許多詩人作品，並不比唐詩遜色，有的甚至可以說是「英光四射」（清人趙翼《甌北詩話》評歐陽修〈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詩的評語，參見本書所選該詩解說）。有了這樣的閱讀體會，再向他人介紹宋詩好處時，底氣雖不一定充足，但起碼內心比較踏實了。

總之，體會主要是兩條：

第一條是多讀。要想知道宋詩究竟如何，得沉下心來認真閱讀，不能輕信他人的批評意見。宋詩好不好，個人喜不喜歡，不讀，怎麼知道？明代楊慎曾拿了宋人張耒的〈蓮花〉、寇準的〈江南春〉、杜衍的〈雨中荷花〉和劉美中的〈夜度娘歌〉等四首詩，給倡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的何景明辨認是唐詩還是宋詩，結果何景明認作唐詩。這四首詩都以風神情韻見長，確實近似於唐詩，以至於專學唐詩的何景明也會看錯。後來楊慎告訴何景明「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何沉吟久之，強辯說：「細看亦不佳。」（見《升庵詩話》卷十二）。這件事只是歷代唐宋詩優劣之爭中的一個小插曲，不過卻反映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歷史上許多批評、否定宋詩的人，其實並未認真讀過宋詩。不讀，便不可能獲得對宋詩的真了解。古代禪宗大德主張「食必親嘗」，宋代高僧大慧宗杲也說：「佛性須是眼見始得。」（見《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這些話，移用於治學，也是至理名言。像何景明那樣未認真讀過多少宋人詩，便從先入為主的某些觀念出發否定宋詩，其實正是治學之大忌。因此，多讀——才能真正進入宋詩，並獲得自己對宋詩的認知。

第二條是細讀。要真正認識宋詩藝術價值所在，僅多讀還不夠，還得在閱讀時仔細推敲。尤其是對宋詩特有的一些寫法，更需細心體會才能得其妙處。比如蘇東坡名作〈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潑潑晴方

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此詩對西湖風景之美的描寫，立意在於說明美的豐富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對於美的發現和欣賞，必須具備善於發現美的眼光和寬廣的審美心態（參本書該詩解說），不過就詩中具體比喻而言，卻有許多耐人咀嚼的意味。比喻的一般原則，多是用具體可感的直觀形象，比喻較為抽象不易感知把握的描寫對象，以增強形象刻畫之功。但在此詩中，詩人描寫的西湖是眼前實景，具體可見，可是作為喻體的「西子」，卻並不存在於現實時空，「西子」的形象，其實誰也沒見過，「西子」之美究竟如何，完全依賴於書本的記載和以往文學作品的描繪渲染。也就是說，「西子」之美，只存在於文字之中，存在於人們的意念想像之中，並不具有確定的形象，不同的人對「西子」之美的想像肯定各不相同，可以說，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西子」。因此，用這樣不確定的形象比喻眼前具體可見的西湖美景，其實並不符合比喻的一般原則。就具體寫法而言，這是「反常」的，但就效果而言，卻「反常而合道」，詩人正是利用了這種美的形象的不確定性特點，營造出無限想像的空間，讓不同讀者生發不同的聯想，從而帶領讀者真正領略西湖無往不在的美景，領略形象描寫中所蘊含的「理趣」。在宋詩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宋詩的想像力價值和審美創造的價值，所謂「英光四射」的東西，正是體現在這些地方。讀宋詩，若在這些方面草率看過，那就難免「入寶山而空回」了。總之，細讀——才能真正領悟宋詩的妙處，保證入寶山而不空回。

當然，無論多讀，還是細讀，都不能只讀宋詩本身，要想真正理解宋詩，還得讀唐詩，只有讀懂了唐詩，才能認識宋詩的傳承和新變。此外，還應該強調，宋詩的時代特色，與宋代文化的繁榮密切相關。在宋代繁榮興盛的文化氛圍中，宋代文學，豐富全面，各種文類共存共榮，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了繁榮的文學景觀。古文、賦、駢文、筆記等由士大夫階層掌握的文體，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革新發展；話本、諸宮

調、鼓子詞、雜劇、唱賺等由新生的各種民間通俗文藝派生的通俗文學，也正式進入文學史的領域，成為此後文學主流的源頭；而興起於唐代的音樂文學——曲子詞，也在宋代達到了發展的高峰。宋詩就是在這樣全面繁榮的文學景觀之中生存發展，在其他文體的輝映下，成為宋代文學一道亮麗的風景。因此，要真正了解宋詩，只讀詩歌本身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廣泛閱讀宋人的其他文學作品，並廣泛涉獵宋人思想學術方面的著述，在更廣泛的思想和文學的背景中，才能理解宋詩的時代特色是怎樣形成的。

話說回來，無論多讀還是細讀，總要有起手入門之處。宋人作詩十分高產，現存宋詩數量超過唐詩許多倍，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撰《全宋詩》，共收現存宋詩作品二四七一八三首（不含殘句），詩人九〇七九人（參見漆永祥《簡論〈全宋詩〉的編纂與學術價值》，載於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古籍整理工作簡報》，二〇〇〇年第五期），如此龐大的數量，濫竽充數的詩人、品質不高的作品自然也會很多。因此讀宋詩最好從讀選本開始，好的選本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引路作用。本書的選注，不敢自許可以引路，只希望盡自己的努力把宋詩的菁華選出來，加以講解，為讀者領略宋詩之美提供參考。不過，限於學識和鑒賞水平，所選之詩，難免有魚目混珠者，注釋難免有疏漏或錯誤，鑒賞解說也難免有不得要領之處，這都希望能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正。

宋詩的優秀作品，還有很多，遠非這個小小的選讀本所能備載。限於篇幅，許多好詩不得不捨棄，一些曾廣泛傳誦過或被其他選本反覆選錄過的作品，也因篇幅的原因沒有選入。像蘇軾這樣的大詩人，各體詩歌只選了二十八首，其實再增加一倍也不嫌多，不過為了留出篇幅讓其他各具特色的小詩人也能出場亮相，不得不把他的許多好詩捨去。選詩的過程，其實難點和關鍵都不在選，而在如何捨棄，取捨之間，真是很費斟酌。作為編選者，自己知道許多好詩被捨棄了，但希望還能盡量保留宋詩的菁華，以見宋詩特色。

之一斑。

本書是應臺灣三民書局的約請而作。此前與書局編輯先生並無交往，數年前在北大靜園五院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初次見面，可以說有一見如故之感。承蒙編輯先生垂青，希望我編選一部宋詩的選讀本出版。我答應了這項約稿，但由於其他工作耽誤，也由於自己的疏懶，拖延了時間，書局一直耐心等待。特別要提到的是，我提交的簡體字原稿，需轉換為繁體字，編輯先生作了大量的編校工作，糾正了原稿的一些錯漏，在體例和排版上也有很多加工。這些工作，其實都非常瑣碎煩雜，但都為本書增色。本書的書名，也是出於編輯先生的建議。這些都足見他們工作的認真負責，這裡需要特別向他們表示感謝。最後還要向三民書局表示我的敬意，感謝書局的垂青，使得本書能和讀者見面。

北京大學中文系 張 鳴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月初稿

十一月二日改定於京西博雅西園

前言

一、宋詩的文化特色與歷史地位概說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學術、科學、藝術、文學全面繁榮的時代。宋王朝實行崇文國策，重視文治教化，印刷業和教育事業都有空前的發展，全社會的總體文化水平超過了以往。高度發達的文化氛圍決定了宋代詩人和詩歌讀者在總體上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宋詩就是高度繁榮的宋代文化孕育的結果。

北宋開國之初，宋太祖曾經問趙普說：「天下何物最大？」趙普熟思良久，答道：「道理最大。」

（見沈括《夢溪筆談·續筆談》）開國君臣之間的這段對話，似乎預示著天下將迎來一個講「道理」的時代。隨著對「道理」的不懈追求，宋代的學術文化走上了繁榮發展的道路。宋人治學，首重人格修養，「聞道」成為人生的最高追求目標。思想家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思想，概括了宋代士大夫立身處世的準則，而他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主張，更展示了宋代士大夫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的人生追求。被宋人推崇為「諸公間第一品人」（黃庭堅《跋范文正公詩》）的范

仲淹，則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進亦憂，退亦憂」，無論進退都以天下為己任，這種精神和人生實踐的要求，甚至已經超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傳統觀念，從中國古代歷史上看，這是一種新型的士大夫人格。由於對士人新型人格的塑造影響深遠，朱熹因此讚譽范仲淹「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九）。正是這種新型的士大夫人格，給宋詩帶來了鮮明的淑世精神。另一方面，宋代許多詩人對人生又有較為超越、達觀的態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種通達的人生情懷，又使他們解脫了悲哀窮愁的困擾，同樣對詩歌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就社會身分和人格而言，宋代許多詩人都集官員（政治家）、學者（思想家）、文學家於一身。如歐陽修、劉敞、王安石、蘇軾、蘇轍、黃庭堅、楊萬里、陸游、范成大、尤袤、朱熹等，都是從政、治學、作詩三不誤的著名詩人。他們的詩歌，無不體現著三位一體的人格所帶來的時代色彩和獨特的個性。其中許多的人生追求首先並不只是做一個文人，北宋劉摯說：「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宋史·劉摯傳》）甚至連大文學家歐陽修也說：「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宋史·歐陽修傳》）重視人格歷練和道德修養，更關注人生，關注社會，有學問，有擔當，有社會理想，同時又腳踏實地，宋代士大夫群體的這些品質，給他們的詩歌創作帶來了厚重的品格。宋詩獨特的政治色彩和議論色彩，也與這樣的人生實踐有關。

宋詩對人生哲理的思考和對現實的關懷，不僅範圍廣，而且開掘深；對自然、社會的觀照和書寫表現，也有鮮明的時代特點。蘇轍曾說過一段著名的話：「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其實這是要求對社會、對歷史、對時事、對自然、對人生各種問題，

要有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思想。「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歐陽修〈鎮陽讀書〉詩）宋人的文化創造，就與這種「出一好議論」的追求直接相關。有了好的議論，在詩歌當中加以表現，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因此，曾被嚴羽所批評的「以議論為詩」（《滄浪詩話》），其實正是宋代文化賦予宋詩的重要素質，既體現了宋人理性的思考，又表現了士大夫階層強烈的現實關懷之心。

宋人作詩，又強調「以意為主」（劉攽《中山詩話》）。重視「意」的表達，同樣是強調表現詩人智性思考的內容。與前代詩歌相比，在當時的學術文化環境中，詩人以新型的文化趣味和審美眼光觀照生活和自然，詩歌的題材大大拓展，表現內容更為豐富，思想趣向和情感體驗也較為複雜。前人沒有寫過的題材可以入詩，前人寫過的題目則要寫出新意，這就形成了前人所說的宋詩「取材廣，命意新」的特點。宋詩「意」的範圍十分豐富複雜，讀書治學、博物考證、日常瑣事、隨感雜記、諧謔調笑等等過去較少入詩的內容，都大量地寫入詩中，詩歌的寫作顯得更為隨意，表現的內容也更為平凡。對日常生活的瑣事細事、自然界的平凡景物的審美觀照，成為宋詩表現的重要內容。品味日常生活的詩意，發掘平凡事物的審美意趣，正是宋詩的重要貢獻。詩歌內容的豐富複雜，審美體驗的日常化、平凡化，都是宋人詩歌審美意識深化、審美能力提高的表現。宋代高度發達的物質文化，沒有窒息宋人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創造力，反而成為他們對精神文化的超越性追求的雄厚基礎，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保持了和諧共榮的發展態勢，歷史的經驗值得認真總結。無疑，保持對物質生活的詩意觀照和品味，是其中關鍵。

宋詩「以意為主」，在藝術表現上就不免借鑑散文的述說方式。許多詩人都大量使用散文文化的句式和

虛詞，追求詩歌語言表達的平易流暢。「以文為詩」，給詩歌文體帶來許多新的因素，尤其是詩歌韻律節奏的變化帶來接受上的陌生化效果，在許多方面改變了詩歌文體的審美特性，甚至使得詩歌文體性質發生了許多微妙的位移。宋詩的新變，最為直觀的表現就是這種從詩體「出位」而向散文的位移。在歐陽修、蘇軾等代表詩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許多「以文為詩」的範例。這也成為宋詩的一個重要特點。

宋代印刷技術的進步，為宋人的讀書提供了方便的物質基礎。宋人讀書，不僅為了科舉應試，也不僅為了治學，許多人更是當作人格提升的自覺追求。「懶思身外無窮事，願讀人間未見書。」（藍奎〈斷句〉）「主人靜坐心無物，讀盡人間未見書。」（趙期〈自述〉）讀書成為生活中不可須臾離開之事，甚至成為時尚，在歷史上這樣的時代並不多。大詩人黃庭堅甚至說：「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與宋子茂書〉）宋代詩人，生活在這樣的條件和風氣中，其人格得益於讀書的培養，其詩歌同樣會體現讀書的薰陶，尤其是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朱熹等大詩人，無不以讀書多而著稱。他們的詩歌，自然體現出濃厚的書卷氣。在精神面貌上，讀書人和學者特有的生活方式、興趣愛好和思想方式決定了詩歌的文化氣質。讀書心得，書畫鑑賞，品茶賞花，考證名物，辯論學術，書房生活，甚至讀書行為本身，更成為詩歌寫作的重要題材。從藝術表現的層面看，宋詩的書卷氣同樣表現得十分突出。比如大量用典，幾乎成為宋詩的標誌性特點。像蘇軾和黃庭堅這樣的大詩人，其詩中典故之豐博，用典方法之層出不窮，都使人歎為觀止。對於詩歌用典的問題，王安石曾經說過：「詩家病使事太多，蓋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轉引自《蔡寬

夫詩話》)這是宋人關於詩歌用典問題最精練也最精彩的意見。實際上，宋詩的用典，在宋人是因讀書多而習以為常的，他們用典故作為表現手段，「自出己意」是關鍵。在這方面，蘇軾和黃庭堅詩歌可以說最為典型，清人趙翼說蘇軾「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甌北詩話》)。蘇軾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是一個著名的比喻，但是仔細推敲，實際上「西子」只存在於史書記載和歷史傳說中，並不是眼前直接可感的事物，把「西子」作為喻體比喻西湖之美，是採用來自書本的意象比喻眼前的自然景物，實際上也是一種「用典」。這樣的寫法，其新奇並不僅僅在於比喻之新，更在於別出心裁的「用典」方式，這就是所謂「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而「情態畢出」。從這樣的例子看，宋詩的用典，具有用歷史文獻的人文價值解讀世界和書寫世界的意義，詩中反復出現的典故，其實又使沉睡於載籍中的文化資源得以在現實語境中復活並閃現光彩，使之以詩意的形式進入新的傳播過程，從而又起到了文化傳承的重大作用，其意義又不僅局限於一兩首詩歌的表現與解讀而已。

宋詩的書卷氣，還表現在詩歌的語言上。宋人較多地從古代經、史、子、集、佛經、道藏、稗官野史等書面文獻中汲取語言資源，詩歌的語言更為書面化。宋詩的傳播，主要靠書面的閱讀，詩歌語言的書面化，實是大勢所趨。

如果從更為廣泛的文化視域中考察，宋代文人作詩，既是為了抒寫情性，又不僅僅為了抒寫情性。詩歌的社會文化功能在宋代得到了許多拓展。詩歌是當時文人身分認同的重要手段，即使是最反對作詩的理學家如程頤，也免不了作幾首詩，這不能只用技癢來解釋。作詩實際上是具有文化修養的證明，北宋呂蒙正未中舉時，生活貧寒，被胡旦輕視，知情者於是對胡說：「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見歐陽

修《六一詩話》對詩才的重視，其實是對文化修養和文人身分的看重。詩歌在宋人手中，還是文人圈的社交工具，宋人詩集中，幾乎家家都收有大量交遊唱和的作品。宋人還把交遊唱和的詩歌編成專門的詩集出版，如著名的《西崑酬唱集》、《坡門酬唱集》、《禮部唱和詩》等等。西崑酬唱還引出了一個詩派的形成，導致了一種詩風的廣泛流行；坡門酬唱聚集了蘇軾及其門下的文學英才，他們通過詩歌唱和交流感情、切磋詩藝，在北宋元祐前後詩壇上同樣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都證明宋人唱和的活動及其唱和的詩歌，具有相當重要的文學史意義，不宜簡單看作應酬而予以否定。宋人又把詩歌的唱和稱為「詩戰」（見王禹偁《仲咸以予編成《商於唱和集》以二十韻詩相贈依韻和之》，從這一稱呼可以看出他們的唱和帶有較量、切磋詩藝的積極目的。而且，詩歌作為詩人之間感情交流的工具，其社會作用更不宜低估。孔子提出的「興、觀、群、怨」的詩教，孔安國解「群」為「群居相切磋」，這可以有兩個層面，一是詩歌閱讀中的「群」，一是詩歌創作中的「群」。如果就後一層面而言，宋人的大量唱和詩，就最為集中地體現了「興、觀、群、怨」詩教中的「詩可以群」。

總之，面對唐詩的高度成就，宋人一方面從唐詩吸取藝術營養，一方面另闢蹊徑，順應時代文化發展的大趨勢，以新型的文化趣味和審美眼光觀照生活和自然，拓展題材，擴大表現範圍，並從藝術構思、手法技巧、篇章結構、遣辭造句等方面努力創新，向深度開掘，取得了傑出的藝術成就。兩宋詩人共同創造了不同於唐詩的詩學體系和詩歌美學風格，在古代詩歌史上與唐詩雙峰並峙。關於唐、宋詩的不同，錢鍾書《談藝錄》曾有準確且精闢的概括：「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而如

果從中國古代詩歌史的長河中看待宋詩的地位，則清代詩學家葉燮《原詩》的描述最為貼切：「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漢詩）則萌芽由蘖，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可見在後人眼中，宋詩地位之重要。

不過，無論後人如何評價宋詩，都不能取代宋人對於本朝詩歌的切身感受。作為文化高度繁榮的時代的抒情文學，詩歌其實是社會精神文化、人格修養和想像力的結晶，在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詩歌占有的地位，後人已經很難有相同的體驗和感受。在宋代，寫詩、讀詩，所體現的是文化修養，是人格氣度和人生趣味。優秀詩人，受到廣泛讚譽，優秀詩作，更是傳誦眾口。蘇軾在世時，其詩歌「落筆輒為人所傳誦。……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所謂「氣索」是呼吸停止、呼吸不暢的意思，可見，讀詩、作詩，對宋代文人而言，意義多麼重要。

二、宋詩的分期與發展演變簡述

宋代詩人在繼承前代詩歌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勇於創新自立。新型的文化氛圍，為宋詩風格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資源。宋儒治學，多有高遠的追求目標，張載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說，就是最有魄力的代表。這種人格自信，這種自我期許，形成了一種時代風尚。由學術文化方面培養起來的自信人格，並不僅僅表現在學術界。在詩歌的領域，時代的自信

人格同樣也為詩風的創新創造了良好的主觀條件。

不過，異於「唐音」的「宋調」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了較長時期的探索、創變和調適，經過高潮興盛，又逐步走向衰落，其三百多年的發展演進歷程，大致上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北宋開國（九六〇）到宋真宗乾興元年（一〇二二），亦即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六十多年。這一時期的文學，從晚唐五代延伸下來的浮弱文風還是文壇的主流，詩歌最初也延續了晚唐五代以來的風氣，學習白居易的詩風成為詩壇的主導傾向，從五代入宋的朝中大臣，後起的新朝文士，甚至水邊林下的僧人隱士，無不沉浸於這種風氣之中。此外還有受鄭谷影響的清淺詩風以及學習賈島、姚合的所謂「晚唐體」，但都未成氣候。白體詩風在宋初流行了近四十年，直到這一派的代表王禹偁去世（一〇〇一）才開始衰落。此後，楊億開始提倡學習李商隱詩歌，並於館閣主持修書時與同僚模仿唱和。楊億曾自述道：「至道（九九五、九九七）中，偶得玉溪生詩百餘篇，意甚愛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間（九九八、一〇〇七），因演綸之暇，遍尋前代名公詩集，觀富於才調，兼極雅麗，包蘊密致，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曲盡萬態之變，精索難言之要，使學者少窺其一斑，略得其餘光，若滌腸而換骨矣。由是孜孜求訪，凡得五七言長短韻歌行雜言共五百八十二首。唐末，浙右多得其本，故錢鄧帥若水未嘗留意掇拾，才得四百餘首。錢君舉《賈誼》兩句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錢云：『其措意如此，後人何以企及？』余聞其所云，遂愛其詩彌篤，乃專緝綴。鹿門先生唐彥謙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蓋聖人之一體也。……世俗見予愛慕二君詩什，誇傳於書林文苑，

淺拙之徒，相非者甚眾。噫！大聲不入于裡耳，豈足論哉！」（見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十四引。關於這段材料的考辨、楊億提倡西崑體的動機、以及宋初白體詩風和西崑體詩風的更替等，參看拙文〈從「白體」到「西崑體」〉，北京大學《國學研究》第三輯，一九九五年。）

楊億隨後將唱和之詩編成《西崑酬唱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學習李商隱的詩風很快風靡一時，取代了白體詩風的地位。如北宋《蔡寬夫詩話》所說：「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西崑體的出現和流行，是這一階段最為重要的現象。楊億提倡學習李商隱，似乎與文章領域的復古主義遙相呼應，變革詩風的動機十分清楚，而西崑體詩歌體現的才華和學力，也使詩壇耳目一新，「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歐陽修《六一詩話》）。因此，宋人一般都把西崑體看作是宋初詩歌的一次變革，楊億本人就把西崑唱和看作是「首變詩格」（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十七引楊億《楊文公談苑》）。田況《儒林公議》卷上也說：「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效之，時號『楊、劉』。三公以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其他賦、頌、章奏雖頗傷於雕摘，然五代以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對楊億最為推崇的當數後來領導詩風變革的歐陽修，《六一詩話》說：「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大年『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這幾乎是毫無保留的肯定了。